

我们的时代

——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黄平 姚洋 韩毓海◎著

邀请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三位优秀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梳理。

作者站在高处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具有开风气之气势。对话以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背景，多层面、多角度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对话既能体现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又因其现实针对性而具有极大的开放空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大家茶坊

社会、经济、文化
三人谈

黄平 姚洋 韩毓海◎著

我们的时代

——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黄平、姚洋、韩毓海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7

(大家茶坊)

ISBN 7-80211-274-5

I. 我... II. ①黄... ②姚... ③韩...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608 号

我们的时代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6K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27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黄平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姚洋 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韩毓海 学者、批评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中心访问学者、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



策划人信箱: momofofo@sina.com

图书策划: 蒙 木
特约策划: 易 晖
责任编辑: 高立志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010-84473188

目录

第一章 我们的问题和出路	1
第二章 漫长的 20 世纪	47
第三章 群众运动、人民主权和民主	79
第四章 思想解放及其遗产	123
第五章 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国家认同	167
第六章 从“历史的终结”处思考	195
第七章 重建知识与“现实”的联系	233
第八章 发展道路、乡村建设和城市化	271
第九章 公平、效率和协调发展	331
第十章 文化、文学和多元化	349
第十一章 国家与社会	373
第十二章 迈向和谐	403
跋	428

第一章

我们的问题和出路



关键词：

交流 理想 社会公正 自主性 传统
后现代 自由主义 集体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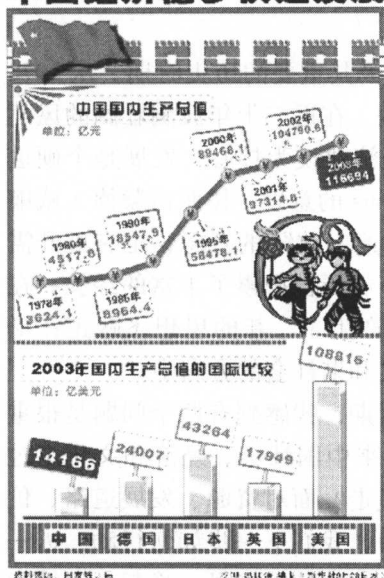
韩毓海（以下简称韩）：我感到我们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今天，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近三十年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发展是个硬道理。我这里的所谓“共识”，是采用了英文 consensus 的意思，按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解释，这个词既有“普遍一致”的意思，也有避开需要讨论、争论的议题的涵义。正是由于过去三十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大概也都感到有新的东西产生了，新的思想飞跃正在形成，它集中体现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中。

对学者来说，处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我感到有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一，从学术的角度，回顾和梳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走过的风雨历程；第二，思考并摸索我们下一步往哪里走？面对资源、发展道路、价值观和世界体系等严峻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压力，我们下一步如何行动？进一步说——用什么样的智慧、方法、价值观，乃至社会规范来指导、唤起、团结我们的社会去行动？社会学和经济学有着深刻的传统，二位也一直都在以卓有成效的学术工作回应和思考着这些问题，读你们的作品我受益良多，而我今天则是抱着学习和求教的目的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讨论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通过交谈，达成差异的互补。

黄平（以下简称黄）：我个人认为，现在不只是学界在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类问题，各行各业，从政府到媒体，从企业家到普通人，都在关注。虽然学界关注它们是比较早的，十多年以前甚至是更早就开始关注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反而学界有点落后了，某些方面还不如第一线工作的人和千千万万当事人敏感和切中要害。所以，虽然我们作为个人，在社会上是很渺小的，在学界也都是小人物，但是坐下来谈我们的问题和出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回过头来看，1992年以后，一方面深化改革推动开放，另一方面，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国内三农和下岗再就业等问题，是知识界和社会各界都来讨论的背景，这些讨论也都与这些问题有关。由于城乡、东西、行业等差距越来越突出，于是，不只是狭义的知识界，连文化、影视、出版、艺术和政府以及其他部门都在考虑：实现初步小康以后，下一步怎么走？往哪里

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 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走? 许多新的思路、战略和政策陆续提出来了, 诸如重点发展西部、三农为重中之重、就业为民生之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等等,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的发展观(“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构建和谐社会。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发展的问题。70年代后期开始搞改革的时候,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际上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和提高收入的问题, 或者说首先是要解决吃饭穿衣, 摆脱短缺和贫困。那个时候的确有个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发展的问题, 现在问题的语境其实已经不同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作为谈话的开端, 来看那些学界能够彼此碰撞和交流的问题, 包括下岗、三农、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 等等。我认为, 对于学界或知识界来说, 问题不只是如何解决它们, 还有个怎样解决的

问题: 是不是更合理, 是应该先解决甲还是先解决乙? 是不是更公平? 是不是在解决的过程中应该更多的人参与和受益? 是不是更有效? 是不是问题的解决具有可持续性?

我以为, 对于知识界来说, 重要的是下一步怎么办, 如何走, 往哪里走? 知识界然有责任提出和考虑: 对于一个古老民族来说, 在经过上百年的革命激荡和经济发展后, 在具有了小康水平乃至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后, 我们还要不要理想? 如果还要, 怎样把它们落到实处, 而不仅仅是少数文人的忧伤和怀古? 对大多数人来说, 它们是不是虚幻的最后让人破灭的梦?

我们不能要求企业界、工人、农民乃至大部分政府官员都来考虑这种长远的问题, 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考虑不讨论今后(20年后、50年后、100年后)如何走、何处去的问题, 那就是失职。展开讨论, 当然包括内容上有哪些、指标上如何测量等, 是更加和谐还是虽然收入大大提高了但是并不那么和谐。各种学科、方法、流派、观点之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要讨论的东西很多, 百家争鸣, 没有分歧反而是不正常的。

现在一讲小康, 似乎就是衣食住行这类东西, 然后就用人均多少美元去衡量, 充其量再从分配上加以限制, 即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我认为, 提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实际上涉及一个基本的社会理念，一个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基本的社会秩序问题，而不只是富裕程度和贫富差别（缩小）的程度。

我觉得现在有点类似上世纪 80 年代，那个时候知识界和各个领域都在讨论或谈论谁先富谁后富、怎样共同富裕等问题。虽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公正不是简单的谁多谁少，这类问题政府的统计部门，新闻部门乃至实际工作部门也在考虑，甚至比我们要细致得多，严密得多。所以，咱们来谈社会公正，至少有两个东西应该能够区别于政府和官员，一是理论上学理上的方法或取向，学术界或知识分子不应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应找到现象背后的相关因素和逻辑结构；二是有一个人文关照的角度，不公的现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有，但是知识界要提出新的理念，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必须是怎样的。这两个层面，一个是学理的关照，一个是价值的关照。

我所在的社会学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或挑战：我们讲可持续发展的时候，首先怎样不“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我们搞了半天搞出来的东西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都明白，无非是些常识，被我们说出来而已，那不能算真有什么贡献；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弄出点媒体和记者都能及时抓住的问题，许多时候媒体和记者们比我们还及时还敏感；也不是如作家艺术家一样，凭着愤怒、激情，看到很多毛病，感触很深，然后留下千古绝唱，社会学没有这个本事，诗词散文小说，不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也不能如实际部门的官员一样，把对体制中的一些问题给数落一下，这方面我们远不如身在其中的官员。我们当然都可以讲常识，抓热点，抒激情，揭问题，但作为一门所谓的社会科学学科，究竟有什么能够不同于百姓和官员，也不同于统计部门和新闻机构？这绝不是要自我标榜，更不是要关起门来搞什么“学科建设”（那实际上是自说自话），一个学科要有意义，就确实是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做出独特的贡献和发现。

这当然不是我们三个人坐下来说说而已，而是从我们各自的学术经历和背景



知识链接

五个统筹，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体现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协调发展观的全新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出发，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再看看我们能不能讲出点什么新的东西。

姚洋（以下简称姚）：
我们从不同的学科来谈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一个很

好的切入点。毓海和黄平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是狂飙突进的年代，中国在这期间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已经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国家控制的价格不到5%；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基本完成，工业产值的80%是非公经济贡献的；在农村，经过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几年前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已经实现了准私有化；户口制度被打破，1.2亿农村居民到城市取得了就业资格；在城市，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新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已经确立……我们所完成的，不亚于苏东任何一个国家所谓的“振荡疗法”所完成的，而且，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的GDP增长率平均达到9%，而苏东各国直到最近还没有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然而，巨变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回头望去，尽管我们的人均GDP翻了两番，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翻了一番；当一些人依靠或明或暗的手段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时候，另一些人的景况却绝对地变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理由问：“这个结果是否公平？”我们到了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的时候了。我同意黄平的提问，我们不仅要回答公平的问题，而且要回答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理想的问题。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追求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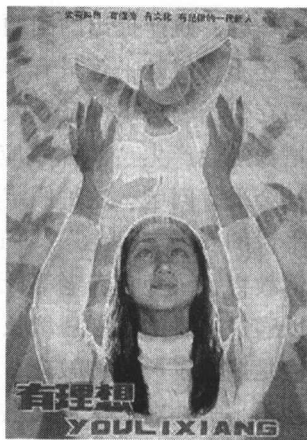
我非常同意黄平的意见，就是我们在这里谈，要和老百姓、记者或官员来谈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仅仅是为社会不公“诉苦”，而是要有前瞻性的东西。比如，利益格局的变化是导致民众关心公正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另外一个比较隐蔽的、但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实和理想在民众心目中错位了，对不上号了……

黄：现实与理想已经有很大的落差了。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名也确实干过许多蠢事和错事，有的人从反面总结经验，干脆就觉得凡理想都是假的，“道德理想国覆灭”了，人人只要向钱看就行了，急功近利，甚至尔虞我诈，都可以名正言顺大行其道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想，只是唯利是图，人与人互相争斗、抢夺，那将是很危险的，何况我们也没有多少可以抢可以夺。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本身，对我们（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有那么多资源来征服、来挥霍吗？所以，勤劳致富、勤俭建国，不仅是道德的，也是理性的。这样来看，当初确立低工资高就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际上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既

是道德的也是理性的。

姚：我们过去所提倡的是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不仅是政治上的平等，而且是经济上的平等。这个理想通过计划经济得到了实施。尽管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这仍然是民众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90年代以来的巨变让现实和以前的理想完全脱节，这种脱节造成了民众的心理失衡。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交谈时需要面对的一个背景。我们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是，过去的理想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90年代以来的巨变是否具有积极意义？我个人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肯定的回答，但这马上就面临平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在平等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今天中国缺少这样的一个平衡点。经济学界的一个主导性的倾向是认为社会公正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题目。大多数经济学家持这样的观点：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就自然会变得公正了。也就是说，以发展，或者更确切地，以经济增长来代替公正。这个观点这么流行，和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有关。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1950年代发现，英国历史上经历了收入和不平等之间的倒U形关系，就是早期收入较低时，英国的收入分配是很不平等的，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平等的程度增加，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数量时，不平等程度就开始下降了。即使后人所做的许多经验研究发现这种倒U形关系并不完全成立，但是很



◎ 80年代的招贴——有理想

多人还是相信这个说法，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副产品，平等只有等到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开始考虑。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经济学家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收入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狭义的理解。我非常赞同黄平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分析。90年代的巨变对利益格局进行了重新划分，产生了很多的社会不公，这是民众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多数经济学家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其他学科的人又倾向于一味强调平等。走极端是最容易的事情，而且，我必须承认，走极端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争论才能显示出事物的真相。但是，如果两个极端都付诸实施，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崩溃。现在有人警告中国不要拉美

化，主要是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能太大，不能走拉美那样的两极分化的道路。但是，我个人认为，拉美更大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传统和由右翼军人政府支持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拉美所实行的资本主义是在军人政府枪杆子支持下的集权资本主义，但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又时常要激发起民众的反抗。我感觉中国目前的民粹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我是研究农村问题的，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不像《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那样，大声疾呼“农民苦，农民穷”，就会被怀疑在道德上有问题。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单单一个“苦”或“穷”字要复杂得多，也广泛和深刻得多。二位的学科背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比我这个经济学家肯定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我很愿意聆听二位的高见。

韩：姚洋提出的问题其实很有典型性，长期以来的确流行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还不仅仅是平等只有等到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开始考虑，而且假定说只要在市场领域里保证私人企业的竞争，就一定会带来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而这种增长则会产生“滴漏效应”，或者说“水涨船高”，市场最终会解决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问题，这种假定其实就比那个“库兹涅茨曲线”更进了一步。涉及到黄平说的发展“理念”。在这样的假定的支配下，对于市场和私有化的强调，与取消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因为它假定：后者是可以通过前者的发展、增长造成的“滴漏”，最终来完成。但众所周知，其结果恰恰是造成了严重的教育、医疗、养老、三农、下岗等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强调市场竞争，与取消社会福利的行为不但是同步的过程，而且，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对立的，这样的市场与社会平等也的确是对立的。

当然，我赞成不能将经济学的视野与其他学科的视野分隔乃至对立起来。而且任何学科都是在视野的不断扩大中发展的。同时，搞文学的，也一定要向经济学家学习，互相不学习、彼此隔膜，这种知识对立不利于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

相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来说，今天文学、艺术——就是今天归文化部管的那个意义上的“文化”，是有些丧失问题与活力了，最多也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已。所以我是抱着个面目不清的“文化”面孔，给二位当陪衬来了。首先，“文化”的确难以有个准确的定义，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礼乐，乃是政治和制度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礼乐之制”的意思。所谓“礼不

下庶人”，是说起码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应该做君子，做社会的表率，而不应该像黄平刚才说的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的骂街，不能混同于技术官僚的纯粹技术化，但在一个世俗化，功利化的时代，首先是社会精英阶层不能起到表率的作用，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所谓礼崩乐坏，不过是社会解体的一种通俗说法而已。

当然，即使古代，恐怕也还是尚刑名、重杀伐的时候多一些，所以陈寅恪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今天文化这个东西，在某些人眼里，可能就比较彻底地属于虚名了。

黄：“文化”最重要的不是图书馆、博物馆、舞剧院、电影院里的物，而是活生生的价值体系和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结构，是支撑人们怎样生活、怎样交往、怎样思考、怎样吃喝拉撒睡、怎样理解生活的意义的东西。

韩：文化既涉及黄平所说的发展理念问题，也涉及制度合法性问题。古今中外，所谓“文化”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对于人的培养，二是指凝聚世道人心的制度。把凝聚世道人心的制度建设当作基础、根本，而将法律、刑名、钱粮当作用途，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谓“礼乐之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文化建设就不是哪一个学科的事。比如经济学科你只管市场、只管GDP增长了多少，不管社会分化、社会公正问题，那也不能说从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社会学也是一样。

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一种偏向，就是越来越实证化了，其中最极端的说法，就是学术研究无目的。所谓纯学问，文学领域就是所谓纯文学。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里，学术研究能够没有目的吗？进一步说，它能完全脱离政治吗？比如说，经济学能够完全脱离社会，不去处理社会公正，社会平等这样的问题吗？何况这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往往是某种看起来“纯粹”的知识，某种“纯粹的经济理论”的“结果”或者“后果”乃至“恶果”，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恰恰告诉我们，不但今天的经济



◎ 孔子画像

学是充分政治性的，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我们的当代文学其实更是充分政治性的，对于整个社会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仅不是纯粹客观的，更不是价值中立的。

黄平刚才说了，现在分科越来越细、大家的事情越来越多，埋头在浩繁的事务、数字、图表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成了技术性、专家性的问题，结果可能连所谓“专家”，彼此之间反而都丧失了交流和对话的基础。如果说学术无法回避社会与政治问题，那么我想知识分子还是应该从凝聚世道人心的制度建设角度多考虑考虑。这样，或许我们三个学科凑在一起，也会有些共同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在17世纪有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时候，当时它可能跟文学，跟世道人心也分不太清楚，亚当·斯密是修辞学教授，好像跟我的专业倒是比较近，他写《道德情操论》，也好像是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对不起，我打断了黄平的话，请你继续。

黄：从时间上说，《道德情操论》在前，《国富论》在后；逻辑上，《道德情操论》其实是《国富论》的基础和前提。



◎ 亚当·斯密

韩：斯密所提出的那个“道德情操”，其实是所谓“市民社会”的道德情操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宣言。这种市民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热衷于商业事务，对世俗世界采取功利主义立场，淡化政治。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看作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个人追逐功利而形成的“自生自发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情操论》确实是《国富论》的基础，或者说，道德是“经济人”的基础。不过，真实地揭示了英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的是斯图尔特（Steward），而不是斯密，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共识。因为史都华揭示了这个过程首先是政治过程，是个“羊吃人”、城市贵族剥夺农村、英国剥夺殖民地的残酷的政治过

程，而不是一个市场的田园牧歌过程。今天的学术界是斯密的天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斯图尔特，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思想界，都过分地受到了斯密的小市民文化的影响，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则缺乏留意和继承。

读北大经济中心的教授，比如姚洋、陈平、林毅夫的文章，我还是很受启发，虽然经济学我完全外行，可是他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却是有关怀的，“讲问题”的。比如社会公正、农村社会、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很有兴趣，也基本上读得懂。可是新古典经济学著作我就不行了，因为我数学不行。经济学大概在马歇尔之后，就数学化了。但是，社会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未必就像数学语言所揭示的那么单纯——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或者学科的不断分化，它的科学化、数学化倾向越来越浓重，最后，经济学学科和它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与现实问题发生分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及其政治经济学传统，你不能不承认是非常了不起的。熊彼特说马克思起码有两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一点，他看到了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对“社会构成”的决定作用，决定某种文化、行为方式的，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第二是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处在蒸汽机所代表的动力学、热力学的世界，代替了牛顿的静力学的时代，熵的世界、混沌理论代替了机械的理论。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无论是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使得他认识到人的出身、身份——也就是他所说的“阶级地位”是建构性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马克思倾向于将社会进程理解为权力之间的分配和竞争，所以熊彼特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很少谈到阶级问题，社会学家也总是将家庭和个人当作分析的基础。这是因为他们分析框架还是古典的、机械时代的理论。

当然对于我们文学专业的人来说，马克思还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文章好极了——不仅仅是具有感召力的“宣言”文体，而且他的方法充满了创造力乃至戏剧性，我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很重视经济的、社会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更为那些反常的、例外的东西所吸引——他经常说实践大于规律，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重要。他研究历史，也经常着眼于历史过程当中那些偶然的因素，注意这些因素怎么变成了“必然”。这其实就是我们文学不断强调的：注意戏剧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其实特别具有文学或者戏剧的思维。

从我们搞文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个多元、差异的社会，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是“以不齐为齐”的社会，是一个承认个性、